

历史转折时期 的政要名人传

《非常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政要名人沉浮录》

目 录

（ 上 卷 ）

【中】胡适 (页码)

从古文到白话文 ,是一场从天上到人间的革命 ;从政到抗日 ,又遭遇了多少风风雨雨.....

新文化运动中 (页码)

抗日战争时期 (页码)

【前苏联】越飞 (页码)

曾经参与苏维埃布列斯特和约这一重大问题的谈判 ,深得列宁赏识和器重 ;他的到来 ,对孙中山晚年的政治生

活 ,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孙(中山)吴(佩孚)间的选择 (国殇)

【前苏联】**摇加伦** (国殇)

这位苏维埃十月、国内战争中赫赫有名的英雄 ,把他在中
国的工作视为自己革命活动的自然延续。可在斯大林的肃反
运动中 ,却被扣以“ 判国罪 ”处死.....

平叛与北伐中 (国殇)

【荷兰】**摇马林** (国殇)

着手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 ,全盘参加和推行了国共
第一次合作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

组建中国共产党 (国殇)

推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国殇)

【印度】**摇罗易** (国殇)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站在由鲍罗廷“ 操纵 ”的党中央集
团对立面 ,说服中共“ 五大 ”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

的决议……

“五大”中的重大影响 (圆缘)

【中】摇陈独秀 (圆缘)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在党的道路、策略、方针及抗日关头 陈独秀到底是怎样选择的呢?难道 党史上一系列的相关责任 仍将继续落在他的名下?

南陈北李 (圆缘)

中国革命两步走 (圆愿)

与鲍罗廷的冲突 (猿缘)

“三次大让步” (猿园)

“七一五”前后 (猿苑)

辞职前后 (猿员)

抗战关头 (猿圆)

【中】摇李大钊 (猿苑)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 ,洞悉国情 ,力主国共合作
……此等先见之明和卓然之举 ,使人百年后仍禁不住扶
卷长叹……

建党时期 (猿苑)

国共合作时期 (獭原)

北伐战争中 (獭原)

胡摇摇适

【中】摇胡适

胡适（~~1891~~原~~1891~~），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安徽积溪人。~~1911~~年赴美留学，受教于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主张文学革命。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病逝与台湾。

摇摇摇摇摇摇题摇摇说

从古文到白话文，是一场从天上到人间的革命；从政到抗日，又遭遇了多少风风雨雨……

新文化运动中

1915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出版，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发轫，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一期杂志上刊登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最初“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这个“发难的信号”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化开始起来替代“旧”文化，并从形态概念上把中国文化三千余年的旧范式转移向一种新范式，在文化意义上为中国进入新时代或者说新世纪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条革命性的准则：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八条“准则”最核心的意见便是提出了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的主张。文章中他列出了三条明白无误的论断：一、“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二、“今日之文学，真正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三、“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篇“刍议”是胡适在美国留学之最后一二年内“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隔三万里寄到中国来发表的，目的也正如他在篇末所说“伏唯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个“国人同

志”首先是指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1918~~1919年~~10~~9月胡适便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上述的“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陈独秀读了这篇《刍议》拍案叫绝，立即签发。他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专门写了一篇跋文，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在紧接着一期的~~圆卷~~远号《新青年》上，他亲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最精彩的核心意见便是如下一段话：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意见显然比胡适的意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1918~~1919年~~10~~9月~~10~~9日胡适在给陈氏的一封长信中仍是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

氏认为主张“白话文学”，提倡言文一致，应是“天经地义”，又何必要再费精神争论不已。“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于余闲与之作无谓之讨论也。”（《新青年》猿卷猿期）难怪胡适也为这“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但是文学革命的“气运”经由这样一位有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者、推行者，很快便汇合成一个声势蓬勃的大运动了。在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还有一位更武断更激进的大将钱玄同。钱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大家，他公开出来支持胡、陈的文学革命无疑使白话文运动的前驱们声威大振。钱氏在陈独秀提出“十八妖魔”作为革命对象的同时，又杜撰了“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两个名词，三千余年来的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被他们推下了地狱，并无情地签贴上封条。又一批勇士猛将汇融其中，一批报刊杂志推波助澜，以白话文为主体内容的文学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了。

胡适在 1917 年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义旗首先“发难”，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二年间精思潜运逐步形成完整的系统思想趋于最终成熟的结果。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逐步形成的完整的系统思想作一个历史的追溯，逻辑地描述出胡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怀孕文学革命的结胎程序。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酝酿过程他在 1928 年 5 月写成的《逼上梁山》一文有过较详细的自述，他把这篇《逼上梁山》也归入《四十自述》中的一章。之所以将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称作为“逼上梁山”，他自己说

是由于被环境所迫，被众人所迫，“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胡适深信“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而中国的语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东西”中的典型了。由于对这一点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又由于自己又是一个有相当保守倾向的人，胡适一向不敢轻言语言文字的改革，对当时留学生界中倡言汉语字母化也很不以为然。但由于学术品性自发的浓厚兴趣和“深深地受了历史的训练”，中国语文改革的问题又时常萦绕于心，无法忘怀。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对中国语文改革问题的潜在兴趣陡然增大凸现，并且使他认为有必要“实在应该在这方面用点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都提出来检讨检讨”。

胡适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语言文字讨论的文章叫做《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这篇文章中胡适虽指出“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但因是“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仅有之教育授受之具”而当然“不可废置”。胡适从本意上并不反对中国文字的字母化，但他意识到中国文字的字母化在技术上是极不容易实行的。他那时也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代替文言，故他当时认为：“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换句话说，当务之急是“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为之他提出四条古文的教授法：一、注重讲解古文，二、鼓励字源学，三、讲求语法学，四、采用标点符号。这是第一阶段，也是胡适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中国语文改革的第一步，而真正的“逼上梁山”则是1918年他与留学生朋友如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他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线”，而“文学革命”的口号也便是在那场争论中首先

提出来的。

1918年夏，梅光迪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在绮色佳与一班朋友度了暑假，将转入哈佛大学去跟随当时有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白壁德（阿瑟·欧文·白壁德）继续深造。怨月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他，其中有句：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就在这首标榜“文学革命”的长诗里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任叔永见了就作了一首打油诗挖苦胡适，把原诗中的外国字连缀起来，所谓“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末句讽刺胡适的“文学革命”狂言：“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为之胡适又步任叔永诗原韵写了一首庄严的答词：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⁵⁾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这里所谓“要须作诗如作文”的“诗国革命”宣言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白话诗的尝试，使他成了中国现代白话诗的“老祖宗”。然而又正是“作诗如作文”的宣言遭到梅光迪、伍叔永的仅驳，他们坚持诗有“诗之文字”，以“文之文字”入诗，便称“革命”，也太浅易了。胡适感到很孤立，

他的“革命”主张也决不仅仅是以“文之文字”入诗的问题，他认为今日文学的大病在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但如何挽救文学上这个“文胜质”的颓势呢，那时他的答案尚未敢想到白话上去，而只是朦胧地提出“不避文的文字”而已。梅光迪固执于“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区别；任叔永来信又说，“有文无质固然构成了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但他又质问道：“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他认真指出：“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任叔永这封信上的“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这句话顿时使胡适的思路开了窍：“文字形式！”正是文言这个僵化的半死的“文学形式”束缚了我国近世文学的健康发展。“文学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何如能达意表情？古人亦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教训。于是胡适从认识上起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说是“文学革命”。

换一种说法，“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到这里他才把中国文学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白话文学——从宋人的白话诗文、白话语录到元明清的白话戏曲

与小说—乃是中国文学的正统产品，代表了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到这时胡适乃正式觉悟到今日中国所需要的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是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

中国文学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连串地有着生气勃勃的变动”。形式变动、工具变动，今天这一场变古文为白话的“变动”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上根本的革命任务。请看胡适对于中国文学史上“文”的革命的描述：

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丧。韩退之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家，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仍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地位，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

至于今日。

韵文的革命也是如此：

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中国文学史如此，欧洲近代文学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丁之创意大利文，乔叟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之创德意志文”，“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逼上梁山》）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也同样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归国记》里还有更明确更详细的论述。胡适为他自己的这个“新觉悟”、“新观念”感到欢欣鼓舞，信心十足，他觉得“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于是他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

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随着这“口气很狂”的誓言，他的白话文运动“宣言”也诞生了：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畅晓达意，优美适用。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长。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八股、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八、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九、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姬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对这个白话文运动的“宣言”，胡适在他的《逼上梁山》上有一段总结：

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

自十九世纪六、七年代后期洋务派的兴起，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也提倡过白话、俗话，国内曾出现过一大批白话报刊与白话文学作品、翻译作品，其思想敏锐的——如黄远庸——也意识到“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用“现代思潮”来促进国人同胞的“猛省”。但无论是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或黄远庸，都不曾有过科学而论辩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倡。他们的“文界革命”除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纯粹政治内容外，几乎没有在文学形式即工具的变革上设计过什么具体的方案，寻着下手的途径。他们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他们的政治努力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这里。胡适便不同了。他为他的“文学革命”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寻得了下手的途径，在根本的方法上教会了一大批追随者与拥护者，新的形式与工具，武装了他们的整个运动。他的文学革命——白话文、白话诗的革新，以及这个革新负驮着的整个中国文化范式的鼎新目的也顺着语文形式、意识观念形式、思想学术形式的革命潮流趋于完成。这个文化史的事实很值得—— 圆苑 ——

我们深思。

中国新文化运动严格而科学地说，是以白话文运动为首义的第一战役，~~1917~~1917年新年伊始，胡适第一个从大洋彼岸将现代意义的新文化的火炬传到了古老的中国，迅速燃起熊熊的大火。“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第一页揭开了。中华民族的文学——面貌、气象、精神、骨子从此截断众流，气象丕变。

抗日战争时期

早在民国初年，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就预见到处理对日关系将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他曾因此想到日本作深入的观察，只是他还想不清楚，是作为传道者去呢，还是作为一个学道者去。这种不确定的心态，他似乎始终不曾完全摆脱。因此也可以说，他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始终未能彻底了解。

~~1937~~1937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战争的序幕。对这一事变，胡适的反应十分平静，平静到近乎不合情理的地步。请看他 ~~怨月~~ 怨月的日记：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指丁文江）都顾及到此一着。中日战（指甲午之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这里没有愤怒，没有抗议。有的只是自责：~~1914~~1914年未能